

·云冈文化研究·

文章编号: 1674-0882(2011)01-0026-07

# 北魏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考略

王银田, 殷 宪

(1. 暨南大学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2.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 山西 大同 037009)

**摘 要:** 北魏神䴥四年(431 年)平城长庆寺《造七级舍利塔砖铭》, 为王银田教授 2005 年 12 月于日本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中村不折书道博物馆所见。此石入藏后并无拓本流行, 更未在日本或中国国内作过任何形式的介绍。此次不仅照录了铭文, 而且阐述了作为皇家寺院的平城长庆寺的大致情况。铭文所记北魏平城长庆寺劝缘兼作铭记的僧人永慈、建造佛塔的僧人恬静、译大藏经 30 部并置之入塔的僧人苴倩和昙云, 则对北魏平城时期的高僧有了新的认识。《长庆寺造塔砖铭》本身又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北魏早期书迹, 其隶楷即楷书而带有隶意的面目, 又揭示了北魏平城时代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这就是北魏早期的碑版书即铭刻书, 或楷隶, 或隶楷, 起决定作用的并不全在于时间的早晚, 而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碑石自身的规格, 同时也取决于书手对各种书体的掌握能力。

**关键词:** 北魏平城; 长庆寺; 造塔砖铭

**中图分类号:** K239.21

**文献标识码:** A

北魏神䴥四年(431 年)《造七级舍利塔砖铭》, 为 2005 年 12 月王银田应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冈村教授之邀, 在出访期间学术交流之余, 于日本著名书法家、收藏家、油画家中村不折先生(1866 年~1943 年)生前创办的东京书道博物馆所见。该馆主要收藏中国历代书法文物, 包括甲骨、青铜器、陶器、玉器、石碑、造像、古砖、瓦当、玺印、封泥、镜铭、法帖、墨迹、经卷文书等珍贵文物。晚清甲午战争期间, 中村曾作为战地记者在中国土地上广泛搜集金石碑刻, 庋藏宏富, 馆藏文物中即有难得一见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等珍品。《北魏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 刻在北魏常见的青砖上, 砖长 16.1cm, 宽 15.5cm, 厚 4.3cm。砖面刻画方界格, 铭文 7 行, 每行 9 字, 凡 63 字, 书体为楷隶。据该馆介绍, 此石入藏后并无拓本流行, 更未在日本国内或中国公开发表并作过任何形式的介绍。此次应允拍照, 并得允许在一家杂志发表, 也是签了协议的。其文云:

神䴥四年辛未二月朔, / 造舍利塔七  
级, 平城长 / 庆寺。万岁昇平, 年丰民 /  
乐。苴倩昙云译大藏真 / 经卅部, 香泥木  
石, 其固 / 若山, 以镇太平。结塔僧 / 恬

淨, 劝缘僧永慈为记。<sup>[1]</sup>

## 一、《北魏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的书法

造塔刻石于太武帝早期的神䴥四年二月(431 年), 依理说这是一个铭刻体书迹的隶书年代, 但是从整体上看, 这件作品却属于楷书面目, 其结字基本属于方形, 但字势由隶书的横平竖直转为略向右昂, 已具备了碑版楷书的基本特点。此作中“年”、“辛”、“倩”等字的横画起笔不作藏锋, 收笔以楷法回护顿笔; 竖画尽皆方起, 而“卅”、“部”等字的收笔左挑出锋; “未”、“长”、“木”等字的捺脚全是楷法, “其”、“真”等字的短撇和右点也全是楷意; “万”、“昙”、“固”、“僧”等字的右上角折笔呈方势, “寺”、“倩”、“淨”等的钩笔全是楷书硬折, 而“泥”字的外钩亦作楷法。再如“利”、“香”、“级”等字的化画为点, 也是楷书时代的产物。草法上石的情况随处可见, 如“塔”之草头、“劝”之左旁即是。砖铭中的“大”字、“太”字竟酷似百多年后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气象, 这当然是横画作楷, 撇重而上出, 捺笔从容饱满所致。我们从此毕竟还是可以窥见隶书的遗痕, 如“平”、“年”等字的中锋, 自是唐楷的特点, 同时也是隶书的遗构, “舍”、“镇”等字的“人”字头右撇浓重, 且撇笔下端向左上造势, 近乎隶法;

收稿日期: 2010-11-28

作者简介: 王银田(1957-), 男, 山西原平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魏晋南北朝考古;

殷 宪(1943-), 男, 山西太原人, 一级美术师, 研究方向: 魏晋南北朝史与书法艺术。

“舍”、“塔”、“固”等字的口字，或小或大，多为上小下大，可见隶法；“岁”、“藏”等字的戈法，隶意浓重；而“石”、“永”、“以”等字则全是隶书结字。

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作家，如康有为、罗振玉之流，在介绍中国北魏早期的书法形态时，总是说其书体在楷隶之间。康有为描述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像》是如此，罗振玉介绍《代王猗卢之碑》也是如此。康氏谓魏初诸碑及稍后的造像题记为楷隶，罗氏谓拓跋氏之猗卢碑为隶楷。前者重在隶，即隶书中有楷法；后者重在楷，云楷书中有隶意。这里说的都是碑版文之书体，并非就北魏书法整体而言的。就魏初书体的整体面目，太武帝始光二年(425年)初“造新字千余诏”讲得十分清楚，就是自从仓颉造字，历经三代，乃至先秦、两汉，至于魏晋南北朝，“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sup>[2](卷4上, P70)</sup>

北魏平城时期碑石中，隶书面目者有《代王猗卢之碑》残拓、《皇帝东巡之碑》、《嘎仙洞祝文刻石》、《孙恪墓铭》、《邸府君碑》、《钦文姬辰墓铭》、《贾兴墓砖》、《吊比干文》等；楷书面目者有《中岳嵩高灵庙碑》碑阴、《司马芳残碑》、《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光州灵山寺舍利塔下铭》、《定州石函盖铭》、云冈《邑师法宗等五十四人造像题记》、《晖福寺碑》等；其余则处于中间状态。从此可以看出，北魏早期的碑版书即铭刻书，在很大程度上与时间早晚关系不是很大，起决定作用的像是碑石自身的规格。凡属皇家碑铭，多用隶书，余则自由度较大。另外，以何种书体上石，在多数情况下是决定于书手对各种书体的掌握能力。在当时士人的心目中，既称碑，就要用汉隶书写。因此在碑石书写过程中，他们会尽可能体现出汉碑的特点。上世80年代，殷宪曾撰文评述《申洪之墓铭》：“前六行基本上是楷隶，而中间从第七行到第十行则成了相当纯正的方笔魏碑，后面的三行大字后记却是十分洒脱而茂密的隶意楷书”。<sup>[3]</sup>这种现象揭示的正是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

北魏早期的情况是，一般的士人已经与汉隶渐行渐远，即使是书碑也不免会拿出自己的手写体看家本事。这样就出现了《北魏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及《中岳嵩高灵庙碑》碑阴等以楷书上石的情况。笔者在阅读《魏书》时，发现《魏书·任城王云附彝兄顺传》所载一则资料：拓跋顺“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sup>[2](卷19中, P481)</sup>

任城王拓跋云，是景穆太子拓跋晃之子，拓跋顺即拓跋云的长子，与孝文帝同为景穆太子之孙。由此可知，他们主要活动于北魏平城时期。北魏平城时期的宗室子弟尚以王羲之书为范本，何况是一般士人呢！有了他们的引领，平城的士子们一定会向道武、明元、太武朝的崔玄伯学习，“尤善草隶行押之书”，因为“玄伯之行押，特尽精巧”，是故“为世摹楷”。<sup>[2](卷24, P623)</sup>除却其父的行押书之外，其子崔浩的书法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魏书·崔浩传》说：“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sup>[2](卷35, P826)</sup>北魏平城时期书法推重崔、卢二家，“玄伯祖(崔)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sup>[2](卷24, P623)</sup>崔浩书法继承家学，以索靖及《急就章》为师，学而有成。有了这样的榜样，便有了刘芳“撰《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sup>[2](卷55, P1227)</sup>刘兰“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sup>[2](卷84, P1851)</sup>陆“暉拟《急就篇》”，<sup>[2](卷40, P906)</sup>也便有了李思穆工草隶，王世弼善草隶书，世弼子王由尤善草隶，刘芳从子刘懋善草隶书，裴敬宪工隶草……。无论是草隶还是隶草，应与崔浩所书百多件《急就章》相去不远。这说的是北魏的通行书迹，而不是碑版书迹。

北魏平城时期的墨书，首推司马金龙墓木板屏风题榜，那是楷书。2005年出土的破多罗漆皮题字，则带有浓重的《急就章》意韵，那是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正是崔浩的时代，他的书风不可能对这件作品不产生影响。去年发现的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年)梁拔胡墓的题壁书是行楷，世纪之初出土的永安二年(529年)的《四爷爷骨》棺盖墨书是带章草味的行楷书，而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量出土的北魏明堂遗址和皇城瓦刻文字却是真草篆隶俱全，而以行草书为主。看来，北魏平城时期的手书体也与东晋及南朝宋齐相仿，这已为上述墨漆书和手书体所证明，也为敦煌文书当中的太和三年(480年)的《冯熙写经》所证明。试想，北魏崔“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sup>[2](卷24, P623)</sup>那么他肯于“染翰”的“朝廷文诰”、“四方书檄”是何种书体呢？十分讲究的碑版体，抑或比较工整潇洒又简便易行的行押书？当然是后者。又《魏书·李修传》说，李修在代京做太医时，朝廷曾“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

[2](卷 91, P1966) 所抄的这么多药方也一定会是手写体,即所谓行押书,而不是费时费力难于掌握的铭刻书。

## 二、《北魏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带来的对平城时期寺、僧、经的新认识

由于北魏《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从未进入过研究者的视线,因而它今日的出现,无论是对平城时期北魏的寺院,还是僧人,抑或译经的冲击都是无可估量的。

(一)北魏平城时期的寺院 史料显示,北魏平城构建最早的寺院是五级佛图及须弥山殿。《魏书·释老志》载:“天兴元年(398年)……始作五级佛图、耆闾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2](卷 114, P3030)这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伊始所建寺院,也是平城时期最早兴建的寺院。从字义看,该寺似建于平城附近被称作耆闾崛山和须弥山的地方,因此有人即指为武州山。该寺包括耆闾崛山殿和须弥山殿、五级浮图以及讲堂、禅堂及沙门座。初建时便“加以缋饰”,各种宗教设施“莫不严具焉”。这里很可能是道武朝高僧法果的居处地。紧排其后的便是神䴥四年(431年)的长庆寺了。依《长庆寺造塔砖铭》可知,魏都平城在太武帝神䴥四年(431年)曾有过一所官方寺院长庆寺,寺内除佛殿外,还建有一座高七层的舍利塔。在这之前,我们只知道北魏平城最早的寺院是耆闾崛山和须弥山殿,最高的塔是建于天安二年(467年)的永宁寺七级浮图,其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殊不知早于永宁寺七级浮图 36 年,平城已有长庆寺七级浮图。永宁寺的七级浮图是三百余尺,亦即三十余丈(魏制)。《水经注》记载洛阳永宁寺塔“基方十四丈”,实际发掘所见塔基呈正方形,每边长 38.2m,每尺折合 0.27286m,300 尺为 82m,如果塔刹是 10m,则层高为 7m 多。长庆寺七级舍利塔的高度也不会比永宁寺七级塔低多少,也能有七八十米,可谓是京城的一处标志性建筑了。据《佛学大辞典》,“舍利塔即堂塔,系安置佛舍利之宝塔也。”因此,长庆寺之舍利塔,下必有佛或高僧舍利在。从后之八角寺原瘞有高僧惠始之骨可知,长庆寺在神䴥四(431年)年前也瘞有一位高僧的灵骨。

在长庆寺之后,魏都平城尚有如下一些寺院,借这个机会,逐一梳理于后:

1. 八角寺 《魏书·释老志》讲了一个故事,明元帝泰常二年(417年)八月,刘裕灭姚泓后,赫连勃勃追杀刘裕子刘义真,坑杀道俗甚众。有清河籍俗

姓张的惠始和尚,身逢白刃而肢体不伤。勃勃闻之大怒,唤惠始于面前,用手中利剑击杀,同样丝毫无损,他见状大惧,千不是万不是地当场谢罪。始光四年(427年)七月,太武帝打败盘踞于统万城的大夏第二代皇帝赫连昌,在统万城礼待了惠始和尚。当年姚秦高僧鸠摩罗什有新经典译出,惠始听说后便亲谒于长安白渠北的禅堂,昼夜不倦地听他讲经。第二年,即神䴥元年(428年),惠始随统万降民东迁京都平城,对僧俗人等“多所训导,时人莫测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礼敬。始自习禅,至于没世,称五十余年,未尝寝卧。或时跣行,虽履泥尘,初不污足,色愈鲜白,世号之曰白脚师”。[2](卷 114, P3033)太延中,终于平城八角寺,并瘞于寺内。太平真君六年,即公元 445 年,制城内不得留瘞,乃葬于南郊之外。后来又在惠始冢上建立石精舍,图其形象于寺中,高允还为其作传,歌颂功德。

2. 五级大寺 《魏书·释老志》云:“兴光元年(454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2](卷 114, P3031)五级大寺之名,有两个涵义:其一,寺院规模很大;其二,寺内有五级浮图。有人认为,五级大寺即道武帝天兴元年所建五级佛图、耆闾崛山及须弥山殿。也有人认为另有所指,是魏都平城内规格很高的皇家寺院,不然不会在文成帝复佛法之初,便在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了五尊“各长一丈六尺”的释迦黄金立像,是体现皇帝“即当今如来”,“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的教义。

3. 永宁寺 《魏书·释老志》云:天安二年(467)“高祖诞载,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2](卷 114, P3037)知此塔为庆贺孝文帝拓跋宏降生而建,是当时京都平城最大的佛寺和官寺。《水经注》在记述如浑水“夹御路南流蓬台西”后云:其水“又南迳皇舅寺西……又南迳永宁寺七级浮图西,其制甚妙,工在寡双。又南远出郊郭。”[4](卷 13, P252)以此观之,北魏的永宁寺在平城东南隅。据《释老志》,“承明元年(476年)八月,高祖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太和元年(477年)二月,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三月,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命中、秘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施僧衣服宝器有差。”[2](卷 114, P3039)注意,承明元年(476年),高祖孝文帝是 11 虚岁,太和元年(477年)是 12 岁。这些活动应当都是临朝称制的文明太后冯氏主持的,只是记在孝文帝名下



罢了。正因为永宁寺七级浮图已成为平城的一处显赫建筑,也因为永宁寺是当时帝后进行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所以迁都后又在洛阳建永宁寺,乃“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sup>[2](卷 114, P3043)</sup>

4. 天宫寺 据《魏书·释老志》,天安二年(467)建永宁寺后,“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sup>[2](卷 114, P3037)</sup>可见,天宫寺建于永宁寺与献文帝皇兴中(467年~471年)之前。天宫寺释迦立像高43尺,合11.73m。此高度与云冈石窟中的第一大窟,即第三窟的主佛(10m)和第十三窟主佛(13m)接近,其规模之大可观。

5. 三级石佛图 建于献文帝皇兴中(467年~471年年),于永宁寺及天宫寺之后,“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sup>[2](卷 114, P3038)</sup>

6. 鹿野佛图 献文帝拓跋弘当政期间(466年~471年)建成,官寺,现存遗迹位于大同市马军营乡小石子村大沙沟北1.5km处,东南距大同宫城建筑遗址7.16km。现存为开凿于山崖南侧的一组小型石窟,东西长30m,尚存洞窟11个,包括居中的造像窟和分列其左右两侧的10个禅窟。崖面遗留的梁孔显示,窟前曾有木构建筑。该佛寺因建于平城北苑(又称鹿野苑)而得名。据《魏书·显祖纪》载,皇兴四年(470年)“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sup>[2](卷 6, P130)</sup>则该寺建于皇兴四年(470年)以前。《释老志》曰:“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sup>[2](卷 114, P3038)</sup>“岩房、禅堂”的记载与现存的石窟吻合。北魏大臣高允有《鹿苑赋》,其文云:“命匠选工,刊兹西岭。注诚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仿佛,耀金晖之焕炳。即灵崖以构宇,竦百寻而直正。絙飞梁于浮柱,列荷华于绮井。图之以万形,缀之以清永。若祗洹之瞪对,孰道场之涂回,嗟神功之所建,超终古而秀出,实灵祇之协赞,故存贞而保吉。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术。……尽敬恭于灵寺,遵晦望而致谒。”<sup>[5](卷 29 上)</sup>

7. 建明寺 据《魏书·释老志》,“承明元年(476年)八月,高祖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是月,又诏起建明寺。”<sup>[2](卷 114, P3039)</sup>此寺应在平城内,余外不见任何其他有关文献。

8. 皇舅寺 寺为文明太后兄冯熙、冯晋国所

造,时当冯太后当政的献文、孝文之时。因冯熙的身份,故名皇舅寺。太武帝朝,冯太后父冯朗被杀后,冯熙流落民间。冯太后临朝后,冯熙一门皆贵,封爵昌黎王。冯熙曾以洛州刺史长期居于洛阳,他“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sup>[2](卷 83, P1819)</sup>《水经注》云:如浑西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迺平城西郭内……其水又南,屈迺平城县故城南……又南迺皇舅寺西……又南迺永宁七级浮图西……又南远出郊郭”。<sup>[4](卷 13, P252)</sup>可知该寺同样位于平城东南隅,在永宁寺之北。另据《水经注》记载,皇舅寺也是以五层佛塔为中心的布局,装饰奢华,“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彩之上,炜炜有精光。”<sup>[4](卷 13, P252)</sup>皇舅寺有法师僧义,“行恭神畅,温聪谨正,业茂道优,用膺副翼,可都维那,以光贤徒。”<sup>[5](卷 24)</sup>这是说,僧义曾任该寺都维那,统理僧众诸事。

9. 思远寺 建于太和二年至三年(478年~479年),官寺,位于平城北郊方山(亦称西寺梁山)上。1981年曾对永固陵前二级台地一处北魏寺院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坐北朝南,包括上下两层平台和踏道,实心体回廊式塔基位于遗址近中央处,塔基北侧为佛殿、僧房基址,山门基址在上层平台南端。自此,论者咸云此即思远寺遗址。但是,2006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研究员等人在发掘调查时却发现,在永固陵西南沿墙另有一处佛殿,佛殿遗址内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陶质小佛像躯体。联系《水经注》有关思远佛寺的记载,“院外西侧有思远灵图,图之西有斋堂。南门表二石阙,阙下斩山累结御路,下望灵泉宫池,皎若圆镜矣”。<sup>[4](卷 13, P252)</sup>意永固陵南之佛寺遗址并非《魏书·释老志》和《水经注》所记载的思远寺,而西南部沿墙的佛教建筑才是思远寺的所在。《魏书·释老志》在太和元年二月记载帝后幸永宁寺设斋,又幸永宁寺设会后,接着说:“又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建思远寺。”<sup>[2](卷 114, P3039)</sup>而《魏书·高祖纪》却说,太和三年秋八月“乙亥,幸方山,起思远佛寺。”<sup>[2](卷 7 上, P147)</sup>《北史》所载与《高祖纪》同,不知孰是。

思远寺曾是帝后幸方山进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继昙曜做北魏沙门统的僧显的禅寺。据《广弘明集》载,有“孝文帝以僧显为沙门都统诏”,<sup>[5](卷 24, P282)</sup>又《魏书·释老志》有“高祖时,沙门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的记载,<sup>[2](卷 114, P3040)</sup>

知僧显为孝文帝和文明太后时高僧，曾任思远寺住持。思远寺为太后临朝时所建，又是建在冯太后特别喜欢后来又为自己选为陵区的方山上。从“思远”二字，不能不令人想到思燕浮图。文明太后走红后，先是在长安为屈死的父亲冯朗(北燕皇子)立文宣王庙，后又在北燕都城龙城立思燕浮图。无所顾忌地打出“思燕”的旗帜。而在几千里外的平城东北山上建思远浮图，与龙城之思燕浮图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10. 方山佛寺 《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八年(484年)“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sup>[2](卷7上, P154)</sup>有的论者以为“方山石窟寺”五字，应分读为“方山”和“石窟寺”，即平城东北向的方山和西向的石窟寺，是有道理的。也有人认为，方山与武州山石窟寺相去50km，一日中难以兼幸，故方山另有石窟寺。上面我们在思远寺条已谈及方山有两座寺院，一在永固陵南的二级台地，一在永固陵台地西南的边缘。想孝文帝幸方山即至山上寺院，但石窟寺有误。况方山石窟寺仅见《魏书》中一条文献，踏遍方山亦无踪迹可寻，权名为方山佛寺。

11. 报德寺 太和四年(480年)春，孝文帝下诏罢鹰师曹，以其地为太后冯氏立报德寺。看来，鹰曹为寺是文明太后的主意，所以孝文帝以其地为太后建报德寺。鹰师指驯鹰的人，这是一种古老的职业，北方游牧民族历来颇重驯鹰，因而有师、有曹。隋承魏制，隋炀帝曾“徵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sup>[6](卷3, P171)</sup>太和四年(480年)，14岁的拓跋宏下诏：“朕以虚寡，幼纂宝历，仰恃慈明，缉宁四海，欲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始灵塔。”于是，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sup>[2](卷13, P328)</sup>以鹰曹变寺院，也是平城北魏王朝封建化进程中的一件可书之事。另据《洛阳伽蓝记》，“报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为冯太后追福，在开阳门外三里”。<sup>[7](P121)</sup>洛阳的报德寺，完全是一种延续，已与鹰师曹全无关系。

12. 紫宫寺 《水经注》卷一三载：“太和殿之东北接紫宫寺，南对承贤门，门南即皇信堂”。<sup>[4](卷13, P251)</sup>太和殿为冯太后生前临朝和卒后停柩之所，在平城宫殿区太极殿中部轴线靠东的又一条轴线上，位置略靠南，紫宫寺则在其东北。据《魏书·高祖纪》，“皇兴元年(467年)八月戊申，生于平城紫宫”。<sup>[2](卷7上, P135)</sup>意此宫后改为宫中寺院，紫宫寺向为比丘尼所居。据《魏故比丘尼统慈庆墓志铭》，其人在平城宫中为

景穆帝昭仪斛律氏躬养，太和中出家，居于平城紫禁城中，当在此寺。因与孝文帝文昭皇后有若同生，遂为比丘尼统，正光五年(524年)终时慈庆86岁，494年迁洛时已56岁，算来她的大半生都在平城紫宫中度过。

13. 祇洹舍 《水经注》卷一三云：“东郭外，太和中，阉人宕昌公钳耳庆时立祇洹舍于东皋，椽瓦梁栋，台壁棖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悉青石也。图制可观，所恨惟列壁合石，竦而不密。庭中有《祇洹碑》，碑题大篆，非佳耳。”<sup>[4](卷13, P252)</sup>皋，同皋，即高地之意，指平城东如浑水东岸的高坡。遗址在今大同城东御河东岸之曹夫楼村西，夯土高台尚在，今名二猴圪瘩。上个世纪80年代，其上曾出土泥塑小佛及其他建筑构件。“二猴”当为“耳侯”之讹。王遇曾为宕昌侯。

14. 武州山石窟寺 今称云冈石窟，北魏时称武州山石窟寺或径称石窟寺，亦称灵岩寺，“云冈”之名始于明嘉靖年间。《水经注》曰：“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sup>[4](卷13, P254)</sup>寺开于文成帝时。《魏书·释老志》谓：“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sup>[2](卷114, P3037)</sup>云冈石窟虽非唐初释道宣叙述的“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龕，容千人已还者，相次栉比。石崖中七里极高峻，佛龕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sup>[5](卷2, P106)</sup>然现存东西1km的规模，四五十所洞窟，五万一千余尊造像同样殊为可观。从其东的青磁窑禅堂，其南的鲁班窑石窟，其西的吴官屯石窟和焦山石窟，足见当年武州山石窟寺的宏伟规模。

(二)北魏《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所及长庆寺的僧人 《造塔砖铭》短短63字，所及当时僧人共4位。第一位是负责劝缘兼为铭记作者的永慈；第二位是负责结塔(建造佛塔)的僧人恬静；第三位和第四位则是负责译大藏经30部并置于塔中的僧人苴倩和昙云。过去我们已经知道，从洛阳、定州或凉州东来西至的僧人有几十位，每一时期都有其代表人物，如道武帝时的法果、太武帝时的惠始、师贤，



文成帝时的昙曜、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5人以及道进、僧超、法存等，冯太后、孝文帝时有僧显、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等。北魏《砖铭》又有4名高僧，充实了北魏平城的高僧队伍。

这4位僧人各有分工，住持永慈负责劝缘和书刻塔记，可见造塔所用资费大量都由化缘而来，也可见当时僧人所具有的文化素质。永慈能编撰这样言简意赅的记文，既写造塔及藏经本身“香泥木石，其固若山，以镇太平”，又不忘称颂“万岁昇平，年丰民乐”的国祚及民乐。如果书丹者也是这位永慈和尚，那么，这位1500多年前的魏都高僧，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的宝贵财富足以令人骄傲。长庆寺这座七级舍利塔，不同于天安元年(466年)造于平城的曹天度发愿塔。前者是实体，是造于长庆寺的，而后者是石质模型，只言造于平城。长庆寺的舍利塔高七级，高80多米，可知恬静是设计师，又是能工巧匠。这说明当时平城的僧人们如同昙曜参与武州山石窟寺开凿一样，于寺塔建造的参与度很高。

(三)《北魏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所记北魏平城寺院的译经、藏经信息 《造塔铭》云，平城长庆寺僧人以“神鼎四年辛未二月朔，造舍利塔七级”，藏“苴倩、昙云译大藏真经三十部”，“香泥木石，其固若山”。关于北魏平城时期的译经，《魏书·释老志》云：“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sup>[2](卷114, P3048)</sup>北魏早期译经大师莫过于鸠摩罗什。据《魏书·释老志》，道武帝时“鸠摩罗什为姚兴所敬，于长安草堂寺集义学八百人，重译经本。罗什聪辩有渊思，达东西方言。时沙门道彤、僧略、道恒、道柰、僧肇、昙影等，与罗什共相提挈，发明幽致。诸深大经论十有余部，更定章句，辞义通明，至今沙门共所祖习。道彤等皆识学治通，僧肇尤为其最。罗什之撰译，僧肇常执笔，定诸辞义，注《维摩经》，又著数论，皆有妙旨，学者宗之。”<sup>[2](卷114, P3031)</sup>这是说十六国前，中国不是没有佛经译本，但由于初译者未能通达东西方语言，错谬处多，号为伪经。于是鸠摩罗什在长安集合了八百人，对“诸深大经论十有余部，更定章句”，使之“辞义通明”，<sup>[8](P108)</sup>成为国中寺院的范本。其中有僧肇者，在众多“识学治通”的高僧中出类拔萃，罗什所译经典往往是僧肇执笔，“定诸辞义”，还注释了《维摩经》，著述的各种经论也“皆有妙旨，学者宗之”。<sup>[2](卷114, P3031)</sup>

其次是沮渠北凉僧昙无讖和智嵩。据《魏书·释老志》，“先是，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有罽宾沙门昙摩讖，习诸经论。于姑臧，与沙门智嵩等，译《涅槃》诸经十余部”。<sup>[2](卷114, P3032)</sup>“神鼎中，帝命蒙逊送讖诣京师，惜而不遣。既而，惧魏威责，遂使人杀讖”。“智嵩亦爽悟，笃志经籍。后乃以新出经论，于凉土教授。辩论幽旨，著《涅槃义记》。戒行峻整，门人齐肃。”<sup>[2](卷114, P3032)</sup>昙无讖和智嵩处于平城时代，但译经地却是凉州，不在平城。

再次是昙曜、吉迦夜和刘孝标等。《续高僧传·昙曜传》云：“释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曜慨前凌废，欣今重复，以和平三年(462年)壬寅，故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流通后贤，意存无绝”。<sup>[8](P108)</sup>昙曜所译经典，据陈垣先生1928年《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一文，记有《大吉义神咒经》二卷，《净度三昧经》一卷，《付法藏传》四卷。存世者惟《大吉义神咒经》，其余二经唐开元中已无完本，近代见于敦煌文书有《净度三昧经》残本，或为昙曜所译。昙曜的《付法藏传》世所未传，但今所流传的另一种版本“亦云冈石窟寺沙门吉迦夜所译。《开元释教录》称吉迦夜为西域人，以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为昭玄统昙曜译《大方广十地》等经五部，刘孝标笔受’”。“现存大藏经《付法藏因缘传》六卷，题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sup>[9](P42)</sup>此经实为吉迦夜据昙曜原译本改译，而由刘孝标手记润色，故能流播至今。刘孝标为南北朝著名文学家，其《世说新语注》和120卷《类苑》都成书于南朝萧梁之时。刘孝标8岁时随母亲以平齐民的身份被掳入平城，其后他在平城度过了18年的读书、抄经、译经生涯，这正是他一生中知识积累的黄金时段。

在武州山石窟寺译经的僧人，据《续高僧传》，“又有沙门昙靖者……乃出提谓波利经二卷”。<sup>[8](P108)</sup>此昙靖或与此《塔铭》译大藏真经的苴倩和昙云有关。不管怎么说，平城译经僧人和经生除武州山石窟寺的昙曜、吉迦夜和刘孝标之外，又增加了苴倩和昙云。大藏真经三十部，可谓数量可观。这告诉人们，长庆寺是北魏早期的一个译经中心，苴倩和昙云所做的工作与鸠摩罗什和僧肇一样，都是“重译”，使伪经变为真经。

北魏是一个儒、释、道并重的朝代，孝文帝深谙儒学经典，但一生讲经、诵经不辍。平城的大臣、贵戚们也是如此，既是博学通才，又耽于译经、讲

经、诵经、写经。如《魏书·赵柔传》便载有“陇西王源贺采佛经幽旨，作《祇洹精舍图偈》六卷，(赵)柔为之注解，咸得理衷，为当时俊僧所钦味焉”。<sup>[2](卷 52, P1162)</sup>《魏书·刘献之传》又云，高祖时饶阳人刘献之博观众籍，“撰《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经》未就而卒。”<sup>[2](卷 84, P1850)</sup>《魏书·崔光传》也载，崔光“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sup>[2](卷 67, P1499)</sup>《魏书·卢景裕传》云，“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sup>[2](卷 84, P1860)</sup>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刘孝标自小在武州山石窟寺，先是写经，后是译经。同样是平齐民，刘芳初到平城，衣食无着，乃“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sup>[2](卷 55, P1219)</sup>笔者闻见盖寡，在敦煌写本中所见魏人写经惟太和三年(479年)冯熙写《杂

阿毗昙心经》以及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前的《大般涅槃经》、永平三年(510年)的《大智度经卷》、延昌元年(512年)的《诚实论》、延昌二年(513年)的《楼炭经卷》和西凉建初元年(405年)的《十诵比丘戒本》、建初七年(411年)的《妙法莲华经》、北凉玄始十六年(427年)的《优婆塞戒》等。另外，从饶宗颐先生介绍文字中知，早年他在法国巴黎曾读到过昙无讖所译墨书《金光明经》四卷。北魏时大臣、贵戚、名士的风气，是帝王带出来的。《魏书·释老志》载，“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sup>[2](卷 114, P3037)</sup>《魏书·裴骏附修弟宣传》云：“高祖曾集沙门讲佛经，因命宣论难，甚有理诣，高祖称善”。<sup>[2](卷 45, P1023)</sup>《魏书·废太子恂传》云，“恂在困蹙，颇知咎悔，恒读佛经，礼拜归心于善。”<sup>[2](卷 22, P588)</sup>

#### 参考文献：

- [1]王银田. 北魏平城的佛寺——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北魏神鼎四年造塔记谈起[J]. 学习与探索, 2010(3): 221-226.
- [2](北齐)魏 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殷 宪. 一方鲜为人知的北魏早期墓志[J]. 北朝研究, 1998(1): 49-52.
- [4](北魏)酈道元著, (清)王先谦等合校. 水经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5.
- [5](唐)释道宣. 广弘明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6](唐)魏 征等.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7](北魏)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8](萧梁)释慧皎. 高僧传合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9]陈 垣. 陈垣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A Survey of the Brick Inscription of the Pagoda of the Changqingsi Temple in Pingcheng in Beiwei Period

WANG Yin-tian; YIN Xian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2. Research Center of Yungang Culture,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Datong Shanxi, 037009)

**Abstract:** "The Brick Inscription of the Seven-story Schelli Pagoda" created in 431 A.D., found in a Japanese museum, caught Professor WANG Yin Tian's eyes. For this inscription, there are no copies available, and there are no introductions to this item in Japan or in China. It not only includes all the content of the inscription, but also includ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hangqingsi Temple, a royal temple. It records the deeds of the monks responsible for donations, for building the temple, and for translating the sutras, which provides no insight into the eminent monks of that period. This inscription self is also a piece of rare work representing the calligraphy of early Beiwei Period. It's Li-Kai font deserves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Pingcheng in Beiwei Period; Changqingsi Temple; brick inscription

[编辑 赵立人]